

《中国MBA早期三杰》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MBA早期三杰》

13位ISBN编号：9787811130560

10位ISBN编号：7811130564

出版时间：2006-6

出版社：湖南大学出版社

作者：许康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前言

按国际管理学界的共识，管理科学课程在工商管理专业开设，应从哈佛大学1908年成立商学院引入泰罗“科学管理”内容，1910年授予首批MBA学位算起，到如今即将满百年。国内外MBA人才在管理界跻身中层乃至高层地位，逐渐发挥了中坚作用，自1988年中美首次在大连联合开办MBA班，1991年至2005年中国大陆获得MBA学位授权的高校由9所猛增10倍多，正式入学人数累计已逾6万人（另有“经贸委班”约3万人，则近10万人）。但近几年，社会舆论且喜且忧，商学院院长们纷纷反思与筹策。了解西方管理学史的专家可能知道，那些对MBA教学内容、方式、作用及出路的质疑，1959年美国两份研究报告（分别由福特和卡内基基金资助）即已指出过，2002年9月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研究报告再发警示。然而西方MBA教育通过自身的改革重获生机，当前“全球MBA巡展”竟有36个国家的290所高水平商学院参加，来中国争夺生源。加入WTO使得中国的MBA教育必须立足本土同时面向世界。于是，媒体和著名高校商学院多次举办“中国MBA发展论坛”，提出了若干对策，2006年第七届论坛即将在湖南大学开幕。管理，是企业竞争力的核心要素；管理，恰是中国企业的“软肋”。“中国MBA教育十周年纪念大会”报道了7位优秀管理者的业绩，但只有1位是在获得MBA学位之后才晋升高位的。确实，检验MBA的实效需要时间。所以，本系列研究的中心论题，并不涉及评估当代中国高校MBA教育的现状，该项任务有“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中国大学管理学院联舍会”，乃至“两大”和“广东管理科学院”武书连工作组，都试图定性与定量地作出回答。本系列研究则重在中国MBA的“史前”或“前史”，再转观今天。因为我们的前期工作发现，20世纪上半叶中国负笈美国攻读过MBA学位课程者远远超过百人，绝大多数回国发展，在旧中国那样艰苦的条件下，竟然做出了骄人的成绩，有些人还撰写或翻译了不少论著，为“科学管理”在中国的传播和实施充当了拓荒者。他们应当成为中国管理科学史研究的重点对象。当今管理学界仍在争论MBA教育该是“国际化”还是“本土化”，这些前辈们的实践就是由“国际”回归“本土”的生动回答。当管理教育界苦于缺乏国产案例或炫耀正在“由一批海外教授领衔，根据国情撰写中国的案例”之时，人们是否想到还有历史案例可挖？其实，本系列研究的着眼点大大超越MBA教育本身，而是对近百年中国管理思想中“洋为中用”和“中国化”的史料的进一步发掘和更深一层分析，为中国近现代管理科学史增添一条重要脉络和充实其内容，以提供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和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管理现代化的有益的参考。其更高的社会意义是：为管理学界落实“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献计献策。国外的管理科学与管理思想史（含管理教育史）研究工作，突出的有哈佛商学院（HBS）A.Chandler Jr.等人开创的Business History，以及国际管理科学院（AOM，或译为美国管理学会，为高校管理学教师学术团体）的Management History分部，其著名学者如J.C.S.George，D.A.Wren的代表作，早已饮誉学界，最近还有S.Crainger的《20世纪管理思想与实践的批判性回顾》，均已译为中文。而与本书更为近似的，当首推英国L.Urwick受国际科学管理委员会（CIOS）委托撰著的《管理备要——70位先驱者生活与工作的历史记录》，初版于1956年。从上述各书中我们整理出国外管理学教育的里程碑如下：1881年首创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学院（PWS），1900年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学院（DTS）授予第一位商学硕士学位，1904年D.Kimball在康奈尔大学首开泰罗式工业管理课程，1908~1910年哈佛商学院正式培养MBA，1916年美国大学商学院协会（AACSB）成立……。令人不满甚至愤慨的是，这些著作对中国MBA没有一个字的记载，S.Crainger的书出版于2000年，内容有印度而无中国，更不应该。反躬自问，本国研究和宣传不力，又何怨外国人？针对这一点，本书着重提供（直接或间接的）原始材料，类似于小钱德勒等人的著名案例书Management Past&Present。所不同的是，该书重在“叙事”，本书重在“写入”。近20多年中国的近现代管理学史研究，首尊袁宝华、冯洪等人在1990年代初分别主编两部管理学百科大辞典时。特别组织专门班子梳理中外管理史料形成的成果；其次突出的有孙耀君等人的西方管理思想史论著，潘承烈等人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古为今用”研究。但真正聚焦到泰罗式的“科学管理”和后来的“管理科学”在中国的引进和发展的管理科学及管理思想史系统论著，似乎我们已出版的两部书分量最重（共125万字）。此外，经济思想史界两位大师，胡寄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有一页（第461页）从“工业经济学”角度提及解放前的管理学著译，马伯煌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则有一章从“民族资本企业家……经营管理思想”方面加以介绍。其他，如中国社科院的经济（学）史研究，上海社科院的企业史研究和上海学研究，还有很多高校专家的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论著，涉及企业管理史的也不少，但基本上没有突出“科学管理”和注意到前辈学人或企业家的MBA身份，更没有对之做专门研究。我们早在十多年前即撰文介绍“中国第一位MBA”（

《中国MBA早期三杰》

当时认为是杨铨，1918年哈佛MBA），后又发现更早的曹云祥（1914年哈佛MBA）。近年将累积的两人资料分别撰为2万字和1.5万字论文发表，可喜的是，我们得到美国哈佛HBS和国际AOM等部门学者之助，再有突破，发现早在1909年（即HBS成立后次年）即有首位中国留学生Chu Ting-Chi、1910年又有Chien Fanshih和 KuaiJu Che入学HBS。（按：国外的学籍档案全用外文，要破译这些中文名字是研究中的难关）据我们初步统计，这所被誉为MBA发祥地和最高学府的学院，前40年中平均每年有近2.5位中国留学生毕业，按HBS首届招收33名正规生和47名特课生计算，可见这个比率竟然超过HBS近年在被视为大热门情况下中国学生的入学率（据报道，该院现在每年在世界招生1000人，中国学生为10~20人）。这一令人惊异的现象难道不足以表明我们中国的管理学前辈具有超前的眼光吗？他们挣脱“贱工轻商”的思想束缚求知于异域，动机和效果如何？本系列研究将试图破解奥秘，提供借镜。现在提交出版的这本著作，写的是三位哈佛MBA老前辈，也是20世纪中国学界名人，官至“副部级”。但他们的工商硕士学位和学历，名实相副的管理知识和业绩，以及与当年国际国内科学管理运动的关联，从未被人从“管理科学史”的角度认真研究和表彰。我们根据多年的查访，并参考学界同仁的成果，独注这个视角，终于“集腋成裘”，旨在抛砖引玉。期待识者和读者共同努力，辑佚钩沉，还历史本来面目。其中曹云祥的材料湮没最久，我们独家用力最多；杨铨的史料甚夥，且得到其哲嗣小佛老先生指导，至为荣幸；潘序伦享寿遐龄，历年亲炙者甚众，且自纂回忆录，使我们费力较少而从各篇文字中获益最大。正是：高山仰止，史海无涯，敷演成书，聊补空白。感谢所有文献的作者、网络文字的提交者，你们的成果使我们得以感触三位“巨人的足迹”；也要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领导和相关的专家的青睐，使我们拥有十年的调研条件；还要感谢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领导和同仁，为本书的出版提供经费和精神上的鼎力支持。中国百年来MBA前贤值得加以深入研究和浓墨重彩描述的比比皆是，可以形成系列丛书，祈望各类社会机构和海内外人士继续关爱和协助。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中国MBA早期三杰》

内容概要

本书研究20世纪中国学界名人——曹云祥、杨杏佛、潘序伦三位早期哈佛MBA老前辈与当年国际国内科学管理运动的关联历史。

书籍目录

英文摘要序言序言参考文献第一编 中国的泰罗——曹云祥第一章 基督教新教家庭的社会和教育圈
第一节 曹云祥父亲是东吴大学奠基者之一第二节 父执之輩是庚款留美的推动者第三节 曹氏与宋氏的“冤家”关系第四节 曹家与颜家的“亲家”关系第五节 曹云祥翻译中国最早的《商业教本》
第二章 曹云祥的留学生涯与外交活动第一节 两江总督端方提供留美机会第二节 曹云祥的留美友朋
第三节 曹云祥是中国首位MBA第四节 曹云祥在欧洲的外交活动第五节 曹云祥出席华盛顿会议
第三章 曹云祥操持清华学校大学部创立第一节 曹云祥在清华校内外的人脉第二节 清华学生和教师的民主风气
第三节 清华学校大学部的酝酿第四节 课外活动的倡导和管理第五节 专业和职业选择的指导
第四章 曹云祥与国学院和“民主治教”第一节 访聘一流国学大师第二节 清华研究院的制度创新
第三节 支持研究院探查远古文明第四节 梅贻琦、陈寅恪的倒曹拥梁第五节 清华“民主治校”的余音
第五章 曹云祥领导科学管理学会第一节 担任世界烟业巨型企业顾问第二节 出任中国工商管理协会总干事
第三节 领导中国科学管理研究与教学第四节 荣任协会理事长和推动企业科学管理第五节 关注安全(防险、防灾等)管理工程
第六章 曹云祥与几个社会团体的关联第一节 曹云祥与中国红十字会第二节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
第三节 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第四节 曹氏家族后人在教育界的贡献第五节 曹氏介绍“大同教”第六节 上海九团体联名追悼曹云祥
第一编参考文献第二编 中国管理科学的拓荒者——杨铨第一章 共举新文化运动的科学大旗第一节 列宁对泰罗制的辩证分析
第二节 金布尔院长弟子和哈佛MBA第三节 杨铨投身新文化运动第四节 中国科学社和《科学》的主将
第五节 科学管理的最早尝试第六节 工商广告自律的研究第二章 从效率主义到行为科学萌芽第一节 泰罗著作的最早译本
第二节 人事效率的第一篇宏文第三节 杨铨的效率与行为科学思想第四节 “人机”与“人际”两和谐
第五节 “财力”和“才力”双增效第三章 科学管理研究和工商管理教学第一节 杨铨首倡“科学管理法”之说
第二节 杨铨等人对技术创新的早悟第三节 工商科学管理教学的先驱第四节 宏观经济史的考察与研究
第五节 辞去工商两科教职第六节 《杨杏佛演讲集》的一、二卷第四章 投身第一次大革命第一节 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第二节 担任孙中山秘书和治丧总干事第三节 参与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第四节 苦闷彷徨和参加科学管理论坛
第五章 中央研究院的科学行政第一节 中国科学的体制化建设第二节 中山陵工程和奉安大典
第三节 中央研究院的组织和办事规则第四节 推进全国的科学管理运动第六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光荣烈士
第一节 参加“第三党”的秘密活动第二节 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第三节 视死如归,光荣牺牲
第四节 科学事业及其管理后继有人第二编参考文献第三编 中国现代会计之父——潘序伦第一章 潘序伦生平和会计师事务
第一节 哈佛MBA和哥伦比亚博士第二节 从商学院系到会计师事务所第三节 会计信誉、人才和制度
第四节 哈佛MBA三杰共商科学管理第五节 斯人虽逝,事业长青第二章 会计诚信准则和中国征信事业
第一节 关于会计职业的操守第二节 关于会计诚信思想第三节 会计师代理征信业务
第四节 论证征信公司的法理依据第五节 提供征信技术指导 and 保险公证事务第三章 潘序伦的会计学著述举隅
第一节 潘序伦主要著译书目辑存第二节 《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简介第三节 《初级成本会计》章节述要
第四节 《会计学》内容简介第四章 立信会计出版社和丛书第一节 会计学术研究和教材编译
第二节 立信学校建立的出版机构第三节 潘序伦的另外几种著作第四节 立信会计出版社第五章 潘序伦与国外会计理论的引入和创新
第一节 会计史与中国传统会计第二节 20世纪中国会计某些人和事第三节 建国前西方会计引入的历史概况
第四节 建国后西方会计的引入和研究第五节 潘序伦晚年的某些创新意见第六节 潘序伦与中西会计记账方法之争
第六章 立信学校的桃李和友朋第一节 黄炎培树立职业学校的楷模第二节 应运而生见机而作的立信学校
第三节 多样化的教学方式第四节 精打细算,勤俭办学第五节 解放初期的立信会计学校第六节 新时期的立信会计高等专科学校
第七节 潘序伦的诤友和同道第三编参考文献后记

章节摘录

第四节 曹云祥在欧洲的外交活动 曹云祥更上一层楼，然后到英国，在著名的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完任“研究员”（按：相当于访问学者）。1914年年底，他进入中国驻英公使馆任二等秘书，1917年8月，兼署驻伦敦总领事。顶头上司是公使施肇基（1914~1920任职）。在清华大学编辑出版的校史类书刊中，校长曹云祥着礼服的照片显得风度翩翩，最令人瞩目。原来民国二年由外交部公布《外交官领事官服制暂行章程》，依据这一章程，外交官领事官服参考西方的外交官服制，再搭配可以展现中国特色的元素设计而成。其中大礼服是在正式的外交场合所穿的，以藏青色呢料为底，衣袖以金线金叶绣上带穗之嘉禾，衣纽有九颗，镀金，上刻篆体中华民国四字。裤子一样藏色，左右各有用金线织成，以编席纹为地，禾穗为采，其边以罗纹为地，竹叶为采的图样。可以照官阶大小分成大使、公使之服，参事及总领事之服，一、二等秘书官暨领事之服，三等秘书官随员暨副领事、随习领事之服，使馆、领事馆委任官之服，是所有使馆官员礼服暇制的基本款。此外还规定了冠、配剑、腰带、外褂和手套等配件。清末100多名留美幼童回国后，仕途并不顺利。从事外交行政工作的有24名，其中领事、代办以上外交官只有12人，外交次长、公使2人，外交总长1人，内阁总理1人。1904年，唐绍仪担任驻英公使。1911年5月8日，清政府宣布成立内阁，梁敦彦出任外务大臣，留学生出身的外交官第一次成为外交最高主官。30年后的曹云祥与这些前辈略同。据1935年出版的《中国外交年鉴》中的《现任重要外交官及领事官》记载，在中华民国外交部86名重要职员中，留学生出身的有73人，占84.88%。从1912年起，正式担任过外交总长的有王宠惠、陆征祥、梁如浩、孙宝琦、曹汝霖、唐绍仪、陈锦涛、伍廷芳、汪大燮、颜惠庆、顾维钧、王正廷、沈瑞麟、胡惟德、施肇基。除陆征祥、孙宝琦、汪大燮、沈瑞麟等少数几人外，其余全是留学生出身。另据1936年出版的《中国外交年鉴》中《现任重要外交官及领事官略历》统计，在86人中，有36人为归国留美生，约占42%。人们常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十月革命的消息是怎么传到中国的？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中国驻俄公使刘镜人奉北洋政府之命，于3月30日在俄国首都彼得格勒（后改名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会见了俄临时政府外交部副部长，宣布承认临时政府。（按：即社会党人克伦斯基政府）11月7日，“十月革命”爆发当天，刘镜人在致外交部的电报中说：“近俄内争益烈，广义派势力益张，要求操政权，主和议，并以暴动相挟制。政府力弱，镇压为难，恐变在旦夕。”电报中说的“广义派”（按：应译为“多数派”），即布尔什维克。次日，刘镜人正式报告了起义的消息：“广义派昨已起事，夺国库，占车站……现城内各机关尽归革党掌握，民间尚无骚扰情事。”这份电报对起义经过作了生动描述。但因北京与彼得格勒之间的电讯暂时中断，北洋政府外交部直到11月27日才接到刘镜人7日的来电，整整迟到20天。倒是中国驻丹麦公使颜惠庆于11月13日和15日根据当地的传闻致电北京外交部，报告俄国发生“二次革命”的消息。但北洋政府追随各协约国政府的政策，拒绝承认苏维埃政府。1918年2月26日，刘镜人根据北洋政府的命令撤离彼得格勒。曹云祥这时任驻伦敦总领事，与颜惠庆信电往返较多，后来赴丹麦接替颜氏，任代办。（史诚，俄国十月革命消息是怎样传到中国的环球时报）俄国劳农政府迁都莫斯科后，威力渐张，外交委员加拉罕，派人至中国外交部送交通牒，请正式恢复邦交。声明将从前俄罗斯帝国时代，在中国满洲及它处以侵略手段，取得的土地、资产、特权，一律放弃，并抛弃庚子赔款，请中国政府再勿以此款供前俄帝国驻京公使及驻各地领事云云。外交部将这封照会呈入总统府及国务总理。总统徐世昌、总理靳云鹏两人召集国务委员等开会，与会者多以旧失权利，忽得返还，正是绝大幸事，但俄国劳农政府未经各国公认，中国方与协约国同盟，不便骤允俄牒，单独订约。嗣闻协约国各派代表到了丹麦，与劳农政府代表开议，因亦派驻丹代办公使曹云祥为代表，乘便交涉。曹代使复请详示办法，政府乃电示曹代使，令他将所定意见，转告俄国劳农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代表。略云：中华民国对于俄国劳农政府前日提议将各种权利及租借地归还中国，以为承认莫斯科新政府之报酬，此种厚意，实感激异常。惟中国为协约国之一，所处地位，不能对俄为单独行动，如将来协约国能与俄恢复贸易与邦交，则中国政府对于俄政府此种之提议，自当尊崇。希望劳农政府善体此意，并希望即通令西伯利亚及沿海各省之官吏及委员，勿虐待中国人民及没收其财产，并令伊城即伊犁，及崑崙即海参崴之劳农政府官吏，对于前日所没收中国商人之粮食及货物，以赈济西伯利亚之饥民，一律予以公平之赔偿，以增进中俄国民之友谊，是所至盼！过了十来天，复接曹代使复电，谓已与劳农政府代表接洽，该代表已允斟酌办理。这消息传到沪上，全国各界联合会等，无不喜出望外。不料中国驻海参崴高等委员李家鳌报称：“崑崙俄国代表威林斯基，不承认有俄国通牒送达中国，恐就中有欺诈等情。”政府得报，又不禁疑虑丛生，

诸多瞻顾：“查前次劳农政府通牒，虽有归还一切权利之宣言，惟旋据高等委员李家鏊电称：询据该政府代表威林斯基，此事恐有人以欺骗手段，施诸中国，危险莫甚。即使俄国人民，确与中国有特别感情，然必须将来承认统一政府时，各派代表，修改条约，方为正当，想中国政府，亦必酌量出之，弗为所愚等语。是前通牒，果否可凭，尚属问题。”北洋政府无能，苏俄政府也未必当真，曹云祥的“接洽”，正如一个画饼，终于不了了之。（民国演义第一百十四回挑滇衅南方分裂得俄牒北府生疑）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等同盟国的失败告终。1919年1月，战胜国在法国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中国作为协约国之一，也派代表参加。当时由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派外交总长陆征祥为代表团委员长，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组为代表，同时请孙中山先生主持的广州革命政府也派代表。孙中山派王正廷为代表，派曹霖生（曹云祥之侄）为代表团秘书长。曹霖生是宋庆龄的表舅1918年毕业于美国西点陆军学校，在广州参加革命政府工作，任孙中山的秘书。在和会进行期间，陆征祥随时电报北京徐世昌请示，王正廷、曹霖生随时电报孙中山请示。孙中山指示王正廷：这样丧权辱国的条件，中国无法接受，应强烈抗议。王正廷、曹霖生得到指示后，即说服顾维钧、施肇基。由于曹霖生同顾维钧私交甚深，早年去美国人小学、中学、大学读书，都得到顾的帮助，他的夫人施美珍又是施肇基的侄女，于是顾维钧、施肇基都站到孙中山的一边。他们会同王正廷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促使陆征祥再向和会主席、副主席提出强烈的抗议。5月4日，北京学生到天安门广场集合后游行示威，每人手执小旗，上书“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迫使北京政府不得不转变态度。1919年6月28日，巴黎和约在凡尔赛宫签字时，中国留学生包围驻地，中国代表团以陆征祥为首，包括代表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发出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并辞去代表职务的电报给徐世昌，并通电各参战国家，说明拒绝签约的理由。他们给徐世昌的电文是：“此事我国节节退让，最初主张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在约外，又不允；改为仅用声明，不用保留字样，又不允。不得已改为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有妨将来提请重议。岂知时直至今午完全被拒。此事于我国领土完全整及前途安危关系至巨，祥等所以始终不敢放松者，固欲使此问题留一线生机，亦免使所提他项希望条件生不祥影响。不料大会专断至此，竟不稍顾我国纤微体面，曷胜愤慨。弱国交涉始争终让，几成惯例，此次若再隐忍签字，我国前途将更无外交可言。”此后，王正廷、曹霖生由法国回到广州，孙中山主持的革命政府在广州大街上搭建牌楼欢迎。王正廷还到上海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圣约翰大学等校演讲，介绍巴黎和会上外交斗争的经过。（顾毓琮，中国代表拒签巴黎和约的经过）这时曹云祥已回国，“遍游南北各地，考察国内情形”，因为离他出国已12年，形势变化不小。1919年7月，曹云祥被任命为驻丹麦公使馆一等秘书，独立“代办使事”。曹云祥在西欧从事外交活动，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一段时间，他为华人和侨胞争取权益，某次还帮助波兰在国际联盟维护其利益，即Upper Salisia问题，曾获该国政府赠予宝星（勋章）。1921年回国任外交部秘书，后任出席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秘书长帮办（助理）。当时外交部的组成是总长、次长、四位司长、四位参事、四位秘书，以下便是各司的职员，他的职位相当于司级。……

《中国MBA早期三杰》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